

第一編

傳統制度的延續

1600-1800年

第二章

清帝國的興盛

1600年前後，一個新時代行將降臨中國。大批西方探險家、商人和傳教士首次經海路帶來了新文明的種子，而已經穿越了西伯里亞的俄羅斯人則向滿洲邊界推進。中國內部，一場重大的轉變也嫻嫻而來。1368年開始掌權的明王朝早已走過了顛峰時期，¹ 急劇衰落，並且備受宦官專權、道德淪落、政治腐敗、士風日下、賦稅高漲、饑饉遍野等問題的困擾。這意味著中國歷史又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了。由張獻忠和李自成率領的兩股流寇，橫行大半個國家幾達二十年之久（1628–1647年），引發了無窮的災難和普遍的動盪。乘著明王朝衰敗和全面混亂之際，東北邊陲的一支異族部落滿洲人起而挑戰中央政權，並最終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新王朝。

清朝的建立

歷史上，吃苦耐勞的滿洲人² 是游牧民族女真族的一支，居住在今天的中國東北地區，靠漁獵為生。十二世紀時其族人已建立了金朝（1115–1234年），金朝曾威脅到南宋王朝（1127–1279年）的生存。女真人雖然在十三世紀中被蒙古人征服，但他們在明朝（1368–1643年）皇帝統治下，恢復了從前的某種獨立地位。明朝皇帝將他們分成了三部：建州、海西和野人。他們向明廷呈獻馬匹、皮草和人參³ 等貢品，而換取中國農產品作為賞賜。

¹ 顛峰期在永樂朝（1403–1424年）。

² 古時候稱為肅慎人。

³ 一種植物的根，中國人認為是滋養補氣的良好藥。

地緣政治在女真族的後來發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居住的地區位於朝鮮的北面、遼東的東和東北面。由於漢人早已在遼東定居，因此女真人對漢人的生活和制度，透過長期的觀察，有了一定的認識。⁴他們也逐漸受到漢人居住和飲食方式的影響。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越來越多的漢人越過邊界，教會了女真人如何耕種土地和建築城堡，由此產生的經濟技術進步，大大改變了女真族以往游牧社會之特性。歷史顯示，這個時期有利於出現一位偉大的領袖，帶領女真人走出邊陲藩屬的處境。⁵

建州女真領主因協助明朝收平東部邊境戰亂有功，被明廷擢升為建州衛指揮使，欽賜姓「李」。後來明廷分建州衛為建州左衛和建州右衛，俱受漢人駐遼東總兵官節制。1574年，左衛都督叫場及兒子塔失（一作他失）與漢人總兵李成梁約盟，追剿桀驁不馴的右衛都督。1582年又對右衛都督之子發動了第二次討伐，在隨後的混戰中，叫場和塔失被殺。此後，女真族內部發生了激烈的自相殘殺，至1583年，塔失25歲⁶的兒子努爾哈赤在族內爭鬥中得勝，贏得了繼承其父都督職位的權利。⁷

努爾哈赤的崛起 據云努爾哈赤(1559–1626年)在年輕時，經常出入漢人總兵李成梁的住宅，因此對中國小說《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產生了興趣。這位雄心勃勃的女真族長通曉邊務，決意報其父祖罹

⁴ Franz Michael,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Baltimore, 1942), 3, 11；和田清：《東亞史研究（滿洲卷）》（東京，1955年），第15–16章。

⁵ Wada Sei,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ise of T'ai-tsu, the Founder of Manchu Dynasty,"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oyko, 16:71–73 (1957); David M. 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Early Manchu State." Paper read before the 6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Pacific Coast Branch,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San Diego, August 28, 1969.

⁶ 中國人從受孕日起計算歲數；25歲實際上等於西方算法的24歲。

⁷ Wada Sei, "Some Problems," 41–50. 努爾哈赤的姓氏是愛新覺羅，意思是「金氏」。參見稻葉岩吉：《清朝全史》（東京，1914年）。但燾中譯本，重印本（臺北，1960年），第7章，第71頁。

難之仇。他不動聲色地推進自己的事業，但天生的機敏使他認識到當時自己的力量有限，故努力抑制住對明廷的敵意。他清楚知道對中國發動任何有計劃的進攻之前，首先必需實現女真諸部的統一。通過兩項精心策劃的聯姻安排和一系列成功的軍事征討，他的實力和地位迅速上升。一名漢人俘虜龔正陸成為他的親信謀士，掌管文牘通信。⁸在這些歲月裏，努爾哈赤始終對明廷表現出極大的忠誠。事實上，他在1590年親自赴北京進貢，1592-1593年間又主動請纓，要率一軍人馬抗擊豐臣秀吉麾下的日本侵略軍，保衛朝鮮。明朝皇帝授予他令人羨慕的「龍虎將軍」封號，這是女真族長獲賜予的最高封號。

努爾哈赤發揮早年經商的經驗，壟斷珍珠、皮毛和人參的貿易，打下軍事征服的經濟基礎。他成功地積聚起大量財富，到1599年，已充分準備好發動遠交近攻式的征討。女真諸部相繼臣服。到1607年，他的地位已變得非常強大，蒙古人因此向他奉上了「昆都侖汗」（即「恭敬汗」）的尊號；1608年，他與明朝的駐遼東統帥達成正式協定，劃定屬下疆域的邊界，並禁止漢人越界。到1613年，努爾哈赤已征服了所有女真部落，只餘海西衛的葉赫一部在明軍支援下與他抗衡。

作為建立新國家的一個步驟，努爾哈赤在1599年倡議創製女真文字，以替代從1444年起就一直使用的蒙文。⁹1601年，他建立了頗具特色的軍事制度——「八旗兵制」。他屬下的士卒被編入四個各有三百人的「牛錄」，由四種不同顏色的旗幟作識別標誌：黃、白、藍、紅。到1615年時，牛錄的數目增加到了二百個，¹⁰於是又建立了另外四個

⁸ 和田清：《東亞史研究》，第637-649頁，〈龔正陸傳補正〉，《東洋學報》，40.1（1957），第110-111頁。

⁹ David M. 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Manchus' Mongolian Policy," i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203.

¹⁰ 許多資料記載其時牛錄數目為四百個，如《大清會典》、乾隆朝《實錄》和孟森的《清代史》（臺北，1960年），第21-22頁。但此說已被發現不可靠。參見 Chaoying Fang, "A Technique for Estimating the Numerical Strength of the Early Manchu Military Forc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195, 208 (1950)；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旗制是受蒙古影響和滿洲狩獵傳統的混合產物，而牛錄的規模在1615年之前一直不固定。見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Early Manchu State." 此處引注得原著作者同意。

旗，顏色同於舊旗，但各鑲以紅邊，唯紅旗本身則鑲以白邊。後來，旗的規模擴大到7,500人，每旗設總管大臣(固山額真)，下分五個紮欄(或甲喇)，每個紮欄含五個牛錄。

「八旗」不只是純粹的軍事組織；在這個從部落封建制向軍事管理和初期國家體制轉變時期，還發揮著原始型行政單位的功效。努爾哈赤屬下的每個人，除少數幾個王公外，都隸屬於一個旗。各旗成員的收錄、納稅、徵募和動員等一應事務俱由旗組織掌管。在平時，旗人及其家眷從事耕種和手工勞作，在戰時，各旗便抽出一定數量的男丁由旗統率赴敵。努爾哈赤通過這一制度將人民組織成一台戰爭機器，顯示出了極高的效率。在早期征戰中俘獲的漢人被淪為奴僕，他們雖然也按旗的方式編成團隊，但並不參加實際戰鬥。¹¹ 1634年和1642年，分別增添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使總旗數達到二十四個。

1616年，努爾哈赤大膽宣佈建立金國，自稱為「天命」汗。兩年後，在喀爾喀部蒙古人的支援下，他作好了進攻中國的準備。他列舉了對明朝的「七大恨」，包括他父祖的被殺、明廷支援葉赫部反對他、漢人獲准屢屢侵越他的國界，以及明廷派一低級使臣前來等等。¹² 這種公開宣揚怨恨的行動，實際上是一種封建式的宣戰。努爾哈赤迅速推進到漢人居住區的邊界，攻取了重鎮撫順，俘獲了一名漢族士人范文程，此人改換門庭，成為他和繼承人的心腹謀士。

明廷遣遼東經略楊鎬率九萬士兵攻擊努爾哈赤，但在撫順以東的薩爾滸遭到慘敗。殲滅明軍主力後，努爾哈赤乘勝進擊抗命不遵的葉赫部，於1619年9月征服了該部。在隨後征討明朝的戰役中，努爾哈赤於1621年5月攻佔了重鎮遼陽和瀋陽。稍後，在1625年，努爾哈赤將他的首都遷到了瀋陽。^{*} 一年後，處在勝利頂峰的努爾哈赤率軍猛攻寧遠。明軍守將袁崇煥用耶穌會傳教士鑄造的大炮一舉擊退了入侵

* 昔日舊稱為奉天。

¹¹ 關於這種奴隸制度的簡明敘述，參見 Jonathan D. Spence,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New Haven, 1966), 1-18.

¹² 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1943-44), I, 597.

者。這是努爾哈赤一生中的第一次大敗，他的尊嚴比身體所受的傷害更重；他於七個月後去世了。

努爾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極(1592–1643年)繼承了父親未竟的事業，首先進攻朝鮮以鞏固後方，並強迫朝鮮人每年進貢銀子；然後轉向中國，率軍在喜峰口突破明朝的長城防線進抵北京，沿途大肆擄掠，帶著豐厚的戰利品返回瀋陽。1631年，皇太極在瀋陽按明廷的模式，建立了一套六部制的政府機構，因而大大推進了從八旗式軍事管理向漢式行政機制發展的制度轉變。不過，六部的結構與明朝體制有所不同——諸部不像明廷那樣設尚書或侍郎。各部名義上都隸屬一名滿洲親王(貝勒)的管轄，這些親王通常都效命疆場而不去諸部理事，部務便留歸三至五名副手(承政)實際主持，副手中包括蒙古人和漢人各一名，但刑部例外，它設有兩名漢人承政，可能是因為該部更需要由有經驗的漢人來處置複雜的司法事務。由此便萌發了滿—漢二元體制(或更確切地說是滿—蒙—漢混合體制)的根源，該體制是二百六十八年裏清朝行政機制的一大特點。¹³

滿洲和清的含義 皇太極聽從漢人僚屬的建議，於1635年禁止使用「女真」和「建州」的稱呼，代之以「滿洲」一詞。1636年5月14日，改王朝的名稱「大金」為「大清」並稱帝。皇太極顯然想清除任何會讓人聯想起中國宗主權的痕迹，並且掩蓋女真諸部曾是明朝藩屬的地位。

「滿洲」一詞的起源頗有趣味。按乾隆皇帝的說法，「滿洲」是漢語「滿珠」的訛誤，而「滿珠」是女真國家一開始就用的古老名稱。¹⁴著名日本學者稻葉岩吉同意這種解釋，並進而認為「滿珠」在女真人、藏人和蒙古人中是一種尊貴的封號。¹⁵另一種解釋是，「滿洲」源自一個發音相似的佛教詞語「曼珠」，其意是「妙吉祥」，該詞出現在藏傳佛教典

¹³ Piero Corradini, "Civil Administ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anchu Dynasty," *Oriens Extremus*, 9:2:136–138 (Dec. 1962).

¹⁴ 蕭一山，第1卷，第49頁。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陳觀勝教授告訴我「滿洲」源自梵文「文殊」一詞，意為「妙吉祥」。我感謝他提供這個資料。

¹⁵ 稻葉岩吉(中譯本)，第18章，第58–61頁。

籍中，而這些典籍傳到了女真諸部。第四種的解釋頗有點神秘：稱「滿洲」源自努爾哈赤尊號「滿柱」的第一個字和「建州」的第二個字「州」加上三點水偏旁形成的「洲」。這些詞——「滿洲」和「清」——都包含三點水偏旁，是根據陰陽五行法則精心設計的。「明」朝的意思是「光明」，而其帝室所姓的「朱」則是「紅色」的意思。「光」和「紅」的形象組合便是「火」，火能熔化「金朝」的「金」。因此，不吉利的「金」字必須改掉。而新創的「滿洲」和「清」等含三點水偏旁的詞，則可預示將來水撲滅「明朝」之火的吉兆。¹⁶

政治經歷也提供了另一個改變王朝名稱的動機。努爾哈赤在1616年首先採用「金」的稱號，以圖喚起女真諸部的懷舊意識，激勵他們去創建一個像十二世紀時的「金」那樣的新帝國。到十七世紀三十年代皇太極當政時，這種情感召喚已不再起什麼作用了。許多漢人已前來加入他的政權，新政權的目標是推翻明王朝，這就需要贏得漢人的支援，避免觸犯他們敏感的神經。以「金」為王朝名無助於這個目標，因為漢人見到「金」便會聯想到古金國入侵他們國家燒殺搶掠的歷史。為了剔除這種遭人厭惡的內涵，皇太極改「金」為「清」，其意是「純潔」。這兩個字發音相近，但意思迥然相異。此外，「清」的發音更像是漢字，因而更容易被漢人接受。

另一種說法是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即金國只征服了中國的北半部而沒有征服其全部，雄心勃勃的皇太極不能滿足於這種不完美的業績，因此他決心以一個新的王朝名稱來重起爐竈。

通過公然稱帝並採用新的王朝名稱，皇太極昭示了推翻明王朝的意向。但他首先是強迫朝鮮國王斷絕與明廷的關係及接受清朝的宗主權；為管轄朝鮮和蒙古事務，他在1638年建立了理藩院。

佔領北京 皇太極準備入侵華北了。1640年他以一支強大的軍隊進攻錦州，明廷為保衛錦州，任命洪承疇為薊遼總督，調集了包括吳三桂在內的八個總兵率13萬軍隊增援該城。皇太極擊潰五萬多明軍，打垮了敵方的頑抗。1642年，錦州城失陷，洪承疇被俘。他備受

¹⁶ 李方晨：《中國近代史》（臺北，1960年），第16頁。

優待，隨後便投靠了清朝一方。皇太極此時將其疆域擴展到長城要塞山海關，但他暫時選擇了避免與駐守此處的明軍重兵直接對壘。相反，他轉向滿洲北部，於1643年將整個黑龍江流域置於清朝統治之下。就在此刻他染病身亡，享年51歲。6歲的第九子福臨(1638–1661年)被選繼位，由努爾哈赤的侄子濟爾哈朗和十四子多爾袞臨朝攝政。

明廷不僅受到滿洲人之逼迫，還受困於橫行肆虐的內部叛亂。多爾袞曾想與一些叛匪聯絡，但還沒等他的計劃成熟，號稱「闖王」的流寇首領李自成(1605?–1645年)便於1644年4月下旬迅捷地推進到北京。遼東總兵及山海關大軍統帥吳三桂受明朝皇帝之命返師勤王，但北京城在吳三桂軍到達前便失陷了。叛軍首領李自成於4月25日進入北京城，明帝在俯瞰紫禁城的景山上自縊。叛軍俘虜了吳三桂的父親，然後又在北京強迫他敦促其子歸順。夾在叛軍和滿洲人之間的吳三桂決定邀請後者與他結盟。

多爾袞早已駐紮在山海關附近，觀察中國事態的發展，吳三桂的相邀令他高興。滿洲軍隊湧進了山海關的城門，吳三桂親自在關上迎接多爾袞。當清軍推進北京之時，李自成焚毀了部分宮殿和北京城九門的塔樓。1644年6月4日，他在清軍逼近之前向西逃竄，清軍於6月6日進入了北京。

為贏得漢人的擁護和信任，多爾袞大肆渲染地為明朝的皇帝和皇后發喪，並盛詞讚揚那些在動亂中喪身的明朝官員。他聲稱滿洲人是前來滅流寇安天下的，部隊在吳三桂和幾位滿洲將領的統率下前去追擊李自成，李自成在1645年6、7月間殞命，據稱他是在湖北省外出搶掠食物時遭鄉民所殺。另一個叛亂首領、並以殘忍嗜殺著稱的張獻忠，1647年在四川被清軍打敗及擊斃。這樣，造成中國幾達二十年之久的動亂的兩股流寇終於被鎮壓了。

儘管滿洲人曾宣稱進入中國，是為了報明帝殉難之仇並除暴救民，但他們的動機顯然並不是那樣崇高無私。滿洲人巧妙地為自己佔領北京一事辯白，稱他們是從叛匪那裏光復了該城而不是從明朝統治者手中搶奪過來。1644年10月，清廷從瀋陽遷至北京，標誌了一個新王朝的開始——這個王朝一直延續到1911年。清朝的第一個皇帝是福臨，按照避免直呼君主個人名字的做法，根據年號稱為「順治」。政務

大權掌握在攝政王多爾袞手裏，他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領導征服中國的未竟之業。

南明抗清運動

儘管滿洲人在北京建立了朝廷，但中國南部地區仍掌握在忠於明朝的人手裏。1645年，這些大明遺臣在明朝的南都——南京，立福王為帝，堅持抵抗。然而，福王卻是一位昏君，怠於政事，一味追求享樂。

其他幾場各不相屬的抗清運動繼續堅守明朝基業。一幫大明遺臣在紹興立魯王為新的領袖，而另一幫人則在福州擁立了唐王，這兩位王爺是叔侄關係，但卻水火不容，最後這兩人都被清軍擊敗。及後，另外一幫明朝遺臣在廣州擁立唐王之弟（即所謂的新唐王）為帝，但他的統治只延續了四十天（1646年）。隨著這些抗清運動的失敗，由萬曆帝（1573–1619年）之孫桂王領導的一個較為穩健的新政權開始在廣東省的肇慶登場亮相了。到1648年時，桂王成功地恢復了對南部和西南部七個省的控制，但在那些與滿人合作的漢人之合圍猛攻下，這場運動最終也垮臺了。

在上述幾場抗清運動迅速地潮起潮落之際，大明忠臣鄭成功（1624–1662年）在沿海地區組織了一場更為持久的抗清鬥爭。鄭成功，也名「國姓爺」，父親鄭芝龍一度是唐王的支持者，而母親則是日本田川家族的女子。唐王對年輕的鄭成功非常賞識，1645年賜他姓「朱」；此後他便以「國姓爺」之稱聞名遐邇，荷蘭人則由此變音稱他為“Koxinga”。唐王待他親如帝室同宗，1646年初敕封他為伯爵及抗清「招討大將軍」。為報帝皇眷遇之恩，國姓爺矢志終身效命明朝。然而，在1646年後期，他的父親叛降清廷，從而使清軍得以經捷徑進攻唐王。國姓爺憎惡其父的行徑，宣誓終生忠於桂王。他結集幾千名部屬攻佔了廈門和金門，以此作為抗清根據地。1655年初，他完善了軍政機構，在福建分所屬部隊為七十二鎮，並建六官分理國事，屬下總兵力達10–17萬人。國姓爺庇護諸多前明士大夫，並且從事對外貿易，為抗清活動籌措資金。

1658-1659年間，國姓爺經海路攻襲浙江和江蘇，佔領了重鎮鎮江；他本來可以攻取揚州以切斷清軍補給線，但他不聽部將建議，決意向南京推進。1659年9月戰敗，麾下500艘船舶被燒毀。他不得不撤回廈門休息重整。此刻他發現廈門和金門用做作戰基地實在太狹窄，於是便屬意於其時被荷蘭人佔領的臺灣，即福摩薩（在葡萄牙語中是「美麗」的意思）。1661年，國姓爺率900艘船舶和25,000名士卒對臺灣發起了一場全力猛攻，荷蘭守軍被征服。1662年2月1日，國姓爺與荷蘭總督揆一（Federick Coyett）締結條約，結束了荷蘭人在臺灣的統治。國姓爺以臺灣為新基地，準備與清軍展開一場持久戰。清廷確實也對他無可奈何，能做的只是處死了他的父親和兄弟（1661年），下令將沿海30-50里範圍內的居民遷往內地（1662年），並禁止大陸的漁船和商船出海，以此切斷國姓爺的資源供應。國姓爺此刻成了大明遺臣中僅存的一線希望之化身，但他卻於1662年6月23日暴卒，年僅38歲。據稱他是死於瘧疾，但也可能是自殺。抗清大業由兒子鄭經繼承下來，但鬥志已不可能與以往同日而語了，且內訌持續不斷。1683年，清軍攻佔臺灣，一年後置為福建省的一個府。隨著這個最後的大明遺臣集團之失敗，清朝完成了對全個中國的征服。

王朝的鞏固與輝煌

順治朝，1644-1661年 順治在1644年10月30日成為中國皇帝，時年僅7歲。政府大權操於多爾袞之手，他有頗具溫情的「叔父攝政王」稱號。1645年，多爾袞獲加封為「皇叔父攝政王」，在1648或1649年更加封為尊貴的「皇父攝政王」，威望顯赫。多爾袞是國家裏權力最大的人；他的話就是法律。所有高層決策全由他作出，連御璽都收藏在他的府邸。向皇帝上奏摺¹⁷的人須呈副本給多爾袞，並等候他的批覆。由於他的地位顯赫，因此覲見皇帝時不必叩頭。

多爾袞對新王朝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在他的指揮下，清軍佔領了陝西、河南和山東諸省；1645年又佔領了江南、江西、湖北和浙江

¹⁷ 奏摺就是大臣向皇帝呈交的報告。

一部分；1646年佔領四川和福建。內政方面，他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職官和措施，歡迎漢族官吏投效政府，甚至允許穿戴明朝服飾。他保留了德意志籍耶穌會士湯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 欽天監監正的官職。但是，多爾袞的兩道旨令卻極大地惹惱了漢族人：一是強迫漢人按滿洲人的風俗蓄髮留辮；二是圈佔漢人的良田用來封賞滿洲王公顯貴和旗人。

多爾袞少年得志，身居高位，實際上損害了自己的前程。他似乎經受不住再無更高官爵可資攀取的處境，開始沉湎於尋歡作樂。1650年年底，他在狩獵途中暴卒於長城附近的喀喇城，享年39歲。

當順治皇帝於1651年親政時，他繼續了多爾袞建立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即任用漢人幫辦內政事務。他悉心研習漢文，以便能無需借助滿文翻譯而看懂漢文奏摺。他繼續實行「一條鞭法」，¹⁸並改善統計制度以減少貪污腐敗；不法行為受到嚴懲。為杜絕漢族士人秘密反抗，他取締了所有的詩社文會等會社。機構方面，他新設了一些職官，其中衙門有宗人府，而官職有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及翰林院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和侍講等。1653年撤銷了內務府，並在宮中建立了由太監掌管的十三衙門取代，太監們對這位年輕的皇帝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雖然皇帝警告他們不要干政，但要使他們完全遠離朝廷事務是不可能的，於是，在1660年，十三衙門又被撤銷了。但是順治皇帝的統治很短暫，1661年便死於天花。

康熙朝，1662–1722年 順治死後，帝位由他的第三子玄燁繼承，時年僅8歲，年號康熙。他之所以被選出繼承皇位，主要是因為他已出過了天花，因此不會夭折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在他幼年即位時，指定了四個攝政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鰲拜是最為專橫的一位，康熙雖然只是個小孩，卻也不滿他的行徑。1667年，康熙在13歲上親政，他爭取到皇后的舅舅索額圖的幫助，以三十款大罪的指控囚禁了鰲拜。康熙帝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出了膽略、機智和決斷，這些將是他長達六十一年統治的基本特徵。

¹⁸ 將所有稅收固定為一定的總數，故名。詳情參見第三章。

康熙的精力非常充沛，每天遵行繁重的作息計劃。他在黎明前就起床，聽一位帝師講儒家典籍，然後在清晨五點主持每天的朝會。但是，在1682年10月21日以後，為了照顧那些不住在皇宮附近的大臣，朝會改到了春夏七點開始、秋冬八點開始。在朝會上，康熙首先收納各部院大臣的奏報，並與他們就有關問題進行磋商。接著他召見一些就重要和緊迫的國務事宜向他提出條陳的內閣大臣。隨後內務府總管大學士前來覲見，請示有關宮廷事務的御旨。最後他將親自召見外省官員或外國使節。在朝會結束後，康熙要批閱由通政使司轉呈的低級官員的奏摺，這些官員是不得親自拜見皇上的。餘下的時間，康熙還要聽帝師講經論典、給太后請安、習練書法或寫作詩文，或與在宮中供職的耶穌會教士研習西式科學和數學。這樣，康熙很少在午夜前就寢。

作為一個君主，康熙接近了理想的典範，他聰穎明慧、領悟力強、寬厚待人、勤勉刻苦、謹慎正直、勤於政務。他經常告誡自己：「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即貽千百世之患。」他的朝政之典型標誌是謹慎履行政務，宮中克勤克儉。在康熙的統治下，風雨飄搖的滿洲統治變得穩固昌盛。

內政方面，康熙做了幾件大可稱道的事情。他深悉民生之艱苦，罷除了以往肆無忌憚的圈地。圈地就是允許滿人任意圈佔漢人良田，而以荒瘠之地易之。他關注黃淮水災，多次親自巡視那裏的防洪工程。他六次巡視江蘇和浙江；四次出塞北巡；四次遊歷山西五臺山。這些出巡有助於他熟悉地方民情，加強中央政府與各地的聯繫。

康熙還委派一些他信任的漢人包衣奴赴外省各處就任漕運、鹽道、織造或按察使等職，以保證錢糧輸入內務府庫房，並確保能獲取機密情報。他向這些人發佈密旨，而他們則用「密摺」向他奏事，皇帝在這些密摺上用朱紅御筆批註。通過這種方式，康熙建立了一套私人的僚屬機構及一個情報網絡。¹⁹

為表現他的仁慈，康熙多次減輕賦稅；在他統治的頭四十四年（1662-1705年）中，他蠲免了9,000萬兩的賦稅，而在1712年一年中就蠲免了3,300萬兩。他在1712年下了一道著名的諭旨，宣佈將當年「錢

¹⁹ Spence, 14-16, 222-240.

糧冊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自後滋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他施行公正嚴厲的司法手段，清除政府內部的腐敗行為；對科考中的徇私作弊，嚴懲不貸。

康熙是一位全力獎勵學術的皇帝。據稱，他對中國典籍和哲學著作極為熟悉。1679年他開設了博學鴻詞特科，收錄五十名飽學之士來編撰《明史》。他們在翰林院博得了優厚的職位，令那些經正常科考獲取功名的士子嫉妒不已，因此他們稱這五十名幸運之人為「野翰林」。康熙的南書房聚集了一些文人學士和書畫名家，他時常賜宴款待一些名儒才子，席間他們自由自在地飲酒賦詩。

由於康熙對學術的獎勵，幾部不朽巨著編纂出來了；其中最著名的有《康熙字典》、重要的辭書《佩文韻府》、《朱子全書》和一部彙編成5,020冊的百科大全《古今圖書集成》等。許多著作都有一篇御筆親撰的序言，因此便帶上了「欽定版本」這一頗具影響的權威性標籤；但顯然這些序言大多是康熙手下博學的漢人士子捉刀而成的。

這位皇帝公認的好學，還包括對藝術和科學的廣博興趣。他收集了大批的書畫精品，而他的御窯更燒製出了許多在今天是無價之寶的精美瓷器。許多中國和歐洲的藝術家在宮中供職；據說如意館裏供養了眾多具有藝術天賦的耶穌會傳教士，他們為皇帝繪畫雕塑。康熙向這些傳教士學習數學，他的崇拜者稱他在數學上的造詣相當高。據說康熙帝醉心學習，「手不釋卷」。但他學業成就的程度或許被誇張了。人們發現他在奏摺上寫的「朱筆批註」²⁰文理頗為幼稚，書法也很平庸。²¹在宮中供職達三十年之久、並在1718年為康熙刻製一幅中國地圖的馬國賢神甫(Father Matteo Ripa)在回憶錄中評論說：「這位皇帝自負精通音樂，更擅於數學，然彼固喜愛科學及其他學識，卻對音樂一無所知，而於數學亦止略知皮毛而已。」²²但不管怎麼說，康熙是

²⁰ 用朱砂筆寫在奏摺頁面空白處或字裏行間的評語。

²¹ Jonathan Spence, "The Seven Ages of K'ang-hsi" (1654–1722),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VI: 2:206 (Feb. 1967).

²² Matteo Ripa,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tr.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o Prandi (London, 1855), 63.

一位興趣異常廣泛而又有心計的君主。他把學識視為善政的基礎，把庶民的幸福視為安定的根本。他始終參照這兩個標準來對他自己和他的統治進行檢討。一位著名的清史學家這樣精闢地概括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統治特徵：「勤政、愛民、崇正學」。²³ 康熙確實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值得讚揚的皇帝之一。一些人把他與路易十四和彼得大帝相提並論。

軍事征討方面，康熙完成了先輩未完成的事業，奠定了一個自蒙古王朝以來版圖最龐大的中華帝國之基礎。他最大的成就是鎮壓三藩之亂。我們記得清朝在征服中國過程中得到了許多漢族降人的幫助。吳三桂曾打開山海關大門迎接多爾袞，此後他為滿洲人東征西討，並將桂王趕到緬甸；清廷加封他為平西王以作獎賞，授命鎮守雲南。尚可喜和耿繼茂原是前明駐遼東軍隊的統帥，投降了滿洲人，分別被封為坐鎮廣東的平南王和坐鎮福建的靖南王，此三人便是所謂的「三藩」。吳三桂統領一支十萬多人的大軍，而另外兩人也各統率二萬人的軍隊。在1667年之前，三藩的軍隊每年耗費清廷約2,000萬兩——超過全國總開支的一半以上——但同時他們在各自轄地內又完全自行其是。

三藩對清廷來說如鯁在喉，順治帝之所以不得不容忍他們，是因為新王朝不敢冒挑起一場內戰之險，但當康熙掌權時，清王朝已相當穩固，於是決定撤藩，並削奪三個藩王的兵權。

吳三桂的反應是在1673年12月28日公開叛亂，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並宣佈建立新的王朝「周朝」。他下令恢復明朝的服飾和髮式；軍隊掛白旗，士卒穿白色號服，²⁴ 宣稱要反清復明。另兩個藩王與他合流，一時間清朝似乎要被推翻了。滿洲旗人無法打敗他們，於是康熙起用了一些漢族將士，到1681年，經過八年苦戰，三藩終於敉平。兩年後國姓爺孫子²⁵ 統治的臺灣也收復，置為福建省的一個府（見前節）。

²³ 蕭一山：《清代史》（重慶，1945年），第64頁。

²⁴ 白色是治喪用的顏色，大約是穿著用來悼念明朝的滅亡。

²⁵ 鄭克塽。

一當擺脫了內戰，康熙便要面對由西北部的厄魯特蒙古人和東北部的俄羅斯人引起的兩個難題。這兩個難題相互聯繫在一起，因為厄魯特人和俄羅斯人似乎很可能結成一個反對清王朝的聯盟。俄羅斯人已征服了西伯利亞並抵達黑龍江；十七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中來自西伯利亞的哥薩克人已不斷地侵襲黑龍江地區，1666年他們修築了雅克薩城作為前哨基地，威脅到滿洲人的故土。幾乎與此同時，在十七世紀七十年代中，厄魯特人的一支、準噶爾部(西部蒙古人)的大汗噶爾丹(1644?-1697年)掌權，他企圖建立一個中亞帝國。他在1679年征服了東突厥斯坦，* 1687年入侵外蒙古，打敗喀爾喀人(東部蒙古人)，推進到克魯倫河。這樣，他與俄羅斯人的聯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為防止這一事態的出現，康熙的策略是首先在雅克薩打垮俄羅斯人，然後與他們簽訂一項帶有懷柔性質的條約。1685年，他派將軍彭春進攻雅克薩，將其夷為平地。次年俄國派來了增援部隊，修整了新的要塞。一支清軍征討部隊被派去圍困雅克薩，但當康熙得知一個由費要多羅(Fedor A. Golovin)率領的俄羅斯外交使團已經上路的消息，他為了爭取俄國人的好感，便撤除了圍城，準備與該使團進行談判。

其結果是在1689年簽訂了《尼布楚條約》，這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簽訂的第一個協定。在這項條約中，俄羅斯同意拆除它在雅克薩的要塞及撤走其臣民，中國則同意割讓有爭議邊界沿線的一些領土，並給予俄羅斯一些貿易特權。通過這種外交上的交換，康熙比較放心，覺得俄羅斯將在他對噶爾丹的戰爭中保持中立。他最終於1696年在昭莫多打敗了噶爾丹。次年，這位厄魯特人領主去世，康熙將清朝統治擴展到外蒙古和哈密，為孫子乾隆帝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徹底征服東突厥斯坦掃清了道路。²⁶

但是，噶爾丹的死並未徹底解決厄魯特問題，他的侄子策旺(一作策妄)阿拉布丹逐漸得勢，在十八世紀初年成為對清朝的新威脅。策旺娶了在十七世紀三十年代移居俄羅斯的土爾扈特部領主阿玉奇之

* 東突厥斯坦英名Eastern Turkestan，在日本、台灣譯為東土耳其斯坦。中國古稱西域，後稱新疆。

²⁶ 關於康熙對噶爾丹之戰和早期中俄關係，詳見第五章。

女，這項聯姻使策旺和阿玉奇有可能合力對抗清朝。為杜絕這種可能，並加強清朝與土爾扈特部的聯繫——也許還為勸說土爾扈特部歸順中國——康熙在1712年向阿玉奇派去了一個使團。該使團由圖理琛率領，穿越西伯利亞，於1714年抵達了伏爾加河。圖理琛拜見了阿玉奇，大約達到了目標。他返國後寫了一部遊記，名為《異域錄》，這可能是清代第一部中國人寫的關於俄羅斯真實情況的著作。

無論在內政還是外交領域，康熙都確實建立了豐功偉績。他樹立了一套穩固、節儉且高效的行政體制，獎勵學術、收平三藩之亂、摧毀臺灣的抗清事業，與俄羅斯建立起外交關係，以及擊敗了噶爾丹麾下的厄魯特部。王朝的輝煌代替了早期的不穩定，而這個國家也以帝國的面目出現。1722年，康熙作為一個相當滿意的君主結束了他的統治。

雍正朝，1723–1735年 雍正在45歲時登基。他生性嚴峻、多疑、猜忌，但卻極其能幹，精力旺盛，這些性格清楚地表現在他的統治中。雍正覺得父親的統治太過寬厚，在晚年尤其如此。因此他一登基就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裏。他不僅駁回宗室諸王想封地稱藩的請求，還進而剝奪了他們的兵權。清初皇帝只直接掌管滿人「上三旗」——正黃旗、鑲黃旗和正白旗——而雍正則將所有八旗盡數掌管在自己手中。

雍正毫不懈怠地統攬行政管理事務，每天批閱無數份奏摺，工作至深夜還在思慮國策大計。他也許是清帝國裏最勤奮的人，對官吏的控制極其嚴厲專斷；其執法嚴峻冷酷，並向全國各地派出了眾多密探，偵察官員是否玩忽職守。為提防秘密反抗，士大夫中間的朋黨活動斷然予以禁絕；1725年雍正帝親書〈朋黨論〉一文，警告那些結朋成黨的大膽之徒。在財政事務上，他將人丁稅和土地稅合而為一。他還確立了向官吏頒發「養廉金」的制度，但同時嚴禁他們徵收多餘稅項或貪贓枉法，此類行為一旦發現必予嚴懲不貸。社會方面，他推行平等主義措施，將乞丐、世僕和蠻民等遭人歧視的「賤民」，提到與普通人一樣的地位。

制度方面，他作了兩項創新：一是創立儲位密建法，以防備有人篡改皇位繼承程序。繼位者的名字被藏於一密匣內，密匣則置於懸掛

在乾清宮大殿前的一塊大匾額背後。建儲的密旨另備副本藏在其他一些安全的地方，以備大行皇帝駕崩時勘對儲選真偽。這項措施一直到清朝末年仍在施行。另一個是1729年在征討厄魯特部期間，為協助皇帝起草諭旨及提供軍政大計決策，成立了軍機處。軍機處起先有三名成員在宮中辦公，以便隨時應對。這樣一個緊湊的小班子能迅速作出決定、提供快捷諮詢且高度保密。由於效率卓著，軍機處在戰事結束後仍保存下來。它搶奪了內閣大學士的職權，大學士的權力降低到僅處理一些日常事務。²⁷

軍事及外交事務與康熙朝相比並無多大變化：來自厄魯特人和俄羅斯人的雙重威脅依然存在。與俄羅斯的《尼布楚條約》沒有議定西伯利亞與外蒙古之間的邊界，而厄魯特部領主策旺阿拉布丹與俄羅斯人之間的交往，再次使中國擔心起他們之間的密謀。雍正繼承父親離間蒙古與俄羅斯人的政策，急於通過一項新的協定來解決與俄羅斯之間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由此簽訂的1727年《恰克圖條約》為中國爭得了一條蒙古與西伯利亞之間的明確邊界，而俄羅斯則獲得了介於上額爾齊斯河與薩彥嶺之間及貝加爾湖以南和西南的近四萬平方英里領土。此外，俄國又取得了一些貿易特權，並獲准在北京設立一座教堂。

在解決俄羅斯問題後，雍正對厄魯特部發動了征剿。但在此期間，俄羅斯方面發來照會，控訴蒙古人在邊境的侵襲行為：蒙古匪幫一直劫掠馬匹、駱駝和牛羊。由於雍正不想中俄關係受到破壞，並希望俄羅斯保持中立，於是在1729年派遣一位叫做托時的侍郎率使團出訪俄羅斯——這是中國派往「西方」國家的第一個正式使團。使團名義上的使命是前去祝賀沙皇彼得二世加冕，但托時抵俄後獲悉沙皇已死，新君是彼得大帝的侄女伊凡諾夫娜(Anna Ivanovna)。1731年1月托時抵達莫斯科，受熱烈招待。(詳見本書108–109頁)他向俄國宮廷提議，如果中國的征剿迫使厄魯特部人逃入俄羅斯境內，俄國政府應將

²⁷ Alfred K. L. Ho, "The Grand Council 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XI:2:167–182 (Feb. 1952). See also Silas Hsiu-liang Wu, "The Memorial System of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1),"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7:30 (1967). 關於軍機處的進一步探討，見本書第46–48頁。

其部領主及王公貴族人等引渡給中國，但可扣留其部民及約束彼等不要騷擾中國；中國將割讓部分從厄魯特部那裏攻佔的領土給俄國作為報償。俄國政府不作承諾，只說等問題出來時再討論引渡事宜。儘管這次使命沒有獲得什麼具體的成果，但事情很快就明朗起來：其時正捲入波蘭王位繼承戰爭的俄羅斯無意援助厄魯特部。派去征討厄魯特人的清軍一開始被策旺阿拉布丹（死於1727年）之子噶爾丹策零打敗，但清軍於1732年在光顯寺（即額爾德尼昭）一役中獲勝，從而取得一項不致大損中國威望的和議。

雍正經常被人指責過分獨裁專制，尤其是大興文字獄。有一場著名的文字獄案牽涉了呂留良，他被告發寫了一部排滿書籍，宣揚華夷（即滿人）畛域之異。呂留良被處以「凌遲」極刑，其子及諸弟子均斬首。雍正皇帝甚至親自寫了一篇議論，²⁸ 為滿清在中國的統治作辯護，並警告漢人鼓動種族悖亂將造成的危險。

如果康熙朝的特點是寬容、寬厚和寬鬆的話，那麼雍正朝的特點便是嚴控、嚴懲和高效。他的這種治國之道反映在他寵信的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鄂爾泰的作風上，鄂爾泰以其固執、專橫而著稱。誠然，雍正帝本人也宣稱寬嚴相濟是善政之要；但他的意思並非是寬嚴調和而趨於適中，相反，他的意思是觀乎其時，審乎其勢，當寬則寬，當嚴則嚴，二者調和並無好處，總要寬嚴適「宜」。

雍正可以被確切地看作是崇尚「法治」的政治家，在他的統治下，君主專制達到了極頂，所有國家權力都集中到他手裏。他的政權有時被描述為殘酷、獨裁和專斷——恰與康熙朝截然相反；但這種相反顯然是相互補充、相得益彰，使他們之後滿清統治的輝煌可以繼續下去。

乾隆朝，1736–1795年 雍正帝死後由第四子弘曆繼位，年號乾隆。乾隆在孩提時深得祖父康熙的寵愛，立意要仿效乃祖。就性情而言，此二人確實非常相像，都很坦率、開朗，也相當寬厚。當1735年下半年乾隆25歲登基之時，他對天祈禱，希望盡可能像他祖父那樣長時間地在位，但不超過其祖的六十一年。

²⁸ 《大義覺迷錄》。

乾隆具備當帝王的良好素質，因為在當王子時就已嚴格接受了完美君王角色的訓練。10歲半時受康熙之命進入上書房，在那裏有十名漢族業師和五名滿族業師悉心向他傳授儒家倫理和滿洲兵術。授課時間從黎明一直延續到正午或下午，課程包括研習經典、歷史、文學、哲學、宮儀、孝道、禮典，後來還有治國之術。另外，他也練習騎射。乾隆非常愛好歷史，尤其喜讀編年史，因為這類書籍提供了歷史上完美的帝王之統治模式。他終身最喜愛的榜樣是英武神勇的皇帝唐太宗（公元627–647年在位），唐太宗統治時期武功的顯赫和物質的繁榮，加之太宗本人的謙遜和仁慈，令這位年輕的貝勒心馳神往。²⁹

在受業的歲月裏，乾隆認識到完美的君主應具「識才舉賢、任用能臣之才智」，並能「竭彼等之智以佐國政」；還學會要避免偏信、提防朋黨傾軋和宦官專權，並應任人唯賢不避貴賤、師事智者而不吝封賞。³⁰

因此，乾隆在登基時已完全掌握了君王的統治術。他行事認真負責，雖然也略有點浮誇。正如他父親認為康熙朝太寬鬆一樣，乾隆認為他父親的統治太過嚴厲，因此刻意宣稱自己傾向於「執中之道」。在統治的初期，由一些老練大臣輔佐，如鄂爾泰（1680–1745年）和張廷玉（1672–1755年）等。先輩開創的事業在他的時代開花結果了，國泰民安、五穀豐登、庫房充盈；王朝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富足景象。

在1745年鄂爾泰去世及四年後張廷玉致仕之後，乾隆開始親自主政。他學祖父般巡幸全國，六次南巡，名義上是為視察河工，但實際上是要享受南方諸省的富庶繁華；四次東遊，五次西狩，多次參謁山東孔府，所到之處，都安排有精緻盛典恭迎聖駕，一片奢華氣氛。

乾隆自視為文學的最高庇護人。他遵康熙之制開博學鴻詞特科，並遍邀名儒隱逸參政。他本人在藝文上的成就並不十分突出，雖然自

²⁹ Harold L. Kahn, "Some Mid-Ch'ing Views of the Monarch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IV:2:230–231 (Feb. 1965).

³⁰ Harold L. Kahn, "The Education of a Prince: The Emperor Learns His Roles," in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ey, and Mary C. Wright (eds.),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1967), 15–44.

詡寫了43,000首詩詞——如果撇開真偽不談，確是相當多產。這些詩作中有一些無疑是由他手下的漢人學士幫忙寫成的。此外，乾隆喜歡在古迹精品書畫上賦詩題詞或加蓋印璽，這個嗜好頗讓人對他的品味提出疑問。當他在一幅卷軸上擠上54條題詞、在另一幅上蓋上13個印章時，他並不顧忌藝術界對此的反應。³¹但無論如何，乾隆表現出了對藝術的濃厚興趣，收藏了許多繪畫、書法、瓷器和景泰藍精品。他的御窯燒出一些世界最精美的瓷器和景泰藍，其造型圖案時時顯露出受到歐洲風格的影響，因為有許多傳教士向中國的宮廷藝術家傳授了西洋繪畫，並以這些成就取悅乾隆皇帝。比如，蔣友仁(Michel Benoist)在1747年建造了一座西式噴泉，朗世寧(G. Castiglione)則在北京城西北約五英里處的圓明園設計了一些義大利式樣的建築。

乾隆發起的最大的文字圖書工程是編纂《四庫全書》。全書有三萬六千多冊，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光是為這部大型文庫編印的《總目提要》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學術工作，彙集了對10,230本圖書所作的簡要評論。《四庫全書》一共抄錄了七套，分藏於全國各處。

在某種程度上，乾隆發起各種文字圖書工程是受到政治動機的推動；這些工程提供了對所有書寫成文的東西進行有效控制和清除針對滿洲人的煽動性資料的途徑。假如發現有疑問和異端的觀點，便即進行壓制，至於作者將記錄在案。據軍機處的報告記載，在1774–1782年間，共發生了24次焚毀「禁書」的事件，所毀圖書達538種共13,862冊。許多人認為乾隆的毀書是繼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書以來最大的浩劫。確實，在乾隆朝時期，皇帝對學術的控制導致了六十多起文字獄。

乾隆的軍事功績是非常卓著的，他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自清初起一直困擾清廷的厄魯特部問題。事實上，他對擊敗厄魯特部信心十足，以至對俄國是否干預都不理會。1759年，整個東突厥斯坦被平定，隨後實行了軍事佔領，在伊犁設置了「總管伊犁等處將軍」，管轄天山南北兩路。大批軍隊和一些領隊、辦事、協辦大臣派駐要塞重地。

³¹ Kahn, "The Education of a Prince," 30–31.

1768年，這個稱作「西域」的地區更名為「新疆」。乾隆將中國統治伸展到中亞心臟塔里木盆地的赫赫功業，使清朝躋身於同漢、唐、元三朝一樣的偉大王朝之列。

除了征服新疆外，乾隆在一些較小規模的軍事征討中也非常成功。他對這些功績十分自豪，1792年，賦寫了一篇誇耀這些成就的銘文，名曰〈十全記〉。〈十全記〉包括了兩次在北疆平定準噶爾部（1755年，1756–1757年）、一次在南疆平定回部（1758–1759年）、兩次撲滅金川叛匪（1747–1749年，1771–1776年）、一次鎮壓臺灣叛亂（1787–1788年）、降伏緬甸（1766–1770年）、征服安南（1788–1789年）及兩次收降廓爾喀人。如果要正確地看待這些事件的話，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從什麼標準來看，只有征服新疆才是巨大的軍事成就，除此之外，〈十全記〉上列舉的其他勝利都只不過是一些綏靖性的行動或一些地方性戰役，並不值得特別稱道。但乾隆彙編這樣一份記錄，並自稱為「十全老人」的行動，本身即表明了他洋洋自得和酷愛炫耀的性格。

確實，乾隆大有值得驕傲和感恩戴德之處，他統治了一個從北面的外蒙古延伸到南面的廣東、從東面的大海之濱延伸到西面的中亞的帝國。帝國內部一片安寧繁榮，還有無數周邊的國家前來進貢。帝國東邊、東南邊和中亞的幾十個國家都承認中國對它們的宗主權：從東北邊的朝鮮到南邊的安南、緬甸和暹羅；西南邊的不丹、尼泊爾和廓爾喀諸部；以及中亞的一些汗國如浩罕、布哈爾、布魯特、巴達克山、阿富汗和哈薩克諸部。乾隆自豪地掌管著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它的版圖大過漢朝和唐朝，僅次於十三世紀的蒙古帝國。乾隆朝是清朝歷史上——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

但就在這王朝鼎盛之時，清朝最終滅亡的因素也已呈現出來了。乾隆的年邁體衰和判斷力減退，與王朝衰敗有莫大的關係。乾隆在65歲時，垂青一位年僅25歲、英俊瀟灑的御前侍衛和珅（1750–1799年）。一年之內，和珅被連連擢升為戶部侍郎，兩個月後升任軍機大臣，一個月後更榮升內務府大臣——這些職位通常都是由那些功勳最為卓著的大臣擔任的。1777年，年僅27歲的和珅便被授予了在紫禁城內跑馬的少有特權，這一殊榮一般是賜予那些年邁走不動路的極品勳

臣的。後來，他又執掌戶部和工部，得以控制帝國的歲收，並能夠將心腹親信安插到一些要職和肥缺。1790年，和坤的兒子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兒，進一步加強了他對年邁皇帝的影響力。因為有皇帝的恩寵作後盾，和坤享受了充分的行動自由。他公開收受賄賂，大肆侵吞錢財。他在官場上的僚屬起而仿效他的做法，而帶兵的同僚則毫無必要地拖延戰事，以便從不斷追加的軍餉中大撈好處。

乾隆朝的最後年月真是體面喪盡，雖然他在當朝六十年後於1795年遜位，但他仍以太上皇的名義垂簾聽政，一直到1799年駕崩後，兒子嘉慶皇帝才得以處決和坤。從1775年得乾隆青睞到1799年去世，和坤肆意禍害朝綱，積聚了一筆令人難以置信的鉅額財富，查抄的家產總值達8億兩——大致相當於15億美元。

和坤的行徑如同靛青溶水一樣四散擴展，無論在京內或外省，無論是文臣或武將，也無論官階高低，一時間貪污成風。旗人變得放蕩不羈、玩物喪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軍打仗之職。漢軍綠營兵也備受種種不當舉措的困擾，從而大大喪失了以往的銳氣，邊關軍務被漠然置之。追求享樂和揮霍浪費的習性導致了道德淪落和王朝的普遍衰敗。乾隆的六次南巡至少耗費2,000萬兩，而往東、西、北各方所作的其他諸次巡遊，究竟花費多少銀兩尚不得而知。他的「十全武功」耗掉了1.2億兩的代價，而其時的平均歲入只有4,000萬兩左右。這些鉅額的開支和追求奢華的普遍風氣，給日後的政府機制運轉留下了巨大的財政困難。

這樣，在乾隆朝行將結束之時，中國正經歷著王朝衰落的開始。昔日昌盛的輝煌仍浮現在表面，但在這表象下面，強盛的實質已經失去了。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西方人開始加強了打開中國貿易和外交大門的努力，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始了。

參考書目

阿桂(編)：《皇朝開國方略》(1887年)，共6冊。

Ames, Roger T., *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Honolulu, 1983).

- Chan, Albert, *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Okla., 1982).
- Chan, Hok-lam,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 (1115–1234)* (Seattle, 1985).
- Chou, Ju-hsi, and Claudia Brown, *The Elegant Brush: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1735–1795* (Phoenix, 1985).
- Corradini, Piero, "Civil Administ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Manchu Dynasty," *Oriens Extremus*, 9:2:133–138 (Dec. 1962).
- Crossley, Pamela Kyle, "Manzhou yuanli Kao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Manchu Heritag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4:761–790 (Nov. 1987).
- Fang, Chaoying, "A Technique for Estimating the Numerical Strength of the Early Manchu Military Forc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192–215 (1950).
- Feuerwerker, Albert, *State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The Ch'ing Empire in Its Glory* (Ann Arbor, 1976).
- Fletcher, Joseph, "Ch'ing Inner Asia c. 1800,"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Eng., 1978), Vol. 10, 35–106.
- Guy, R. Kent,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ss., 1987).
- 蕭一山：《清代史》（重慶，1945年），第3–4章。
- ：《清代通史》，修訂本（臺北，1962年），第1卷，第1–5、8–21、26–30章；第2卷，第1–4章。
- Huang, Pei, "Five Major Sources for the Yung-cheng Period, 1723–173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VII:4:847–857 (Aug. 1968).
- ，*Autocracy at Work: A Study of the Yung-cheng Period, 1723–1735* (Bloomington, 1974).
- Hummel, Arthur W.,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1943–44). 「努爾哈赤傳」、「皇太極傳」、「多爾袞傳」、「順治（福臨）傳」、「康熙（玄燁）傳」、「雍正（胤禛）傳」、「乾隆（弘曆）傳」。
- 稻葉岩吉：《清朝全史》（東京，1914年）。但叢中譯本（臺北，1960年），第1–2、7–12、17–18、24–32、39–43、47–48章。
- Ishida, Mikinosuke,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Giuseppe Castiglione (Lang Shih-ning), A Jesuit Painter in the Court of Peking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19:79–121 (Tokyo, 1960).
-

- Kahn, Harold L., "The Education of a Prince: The Emperor Learns His Roles," in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ey, and Mary C. Wright (eds.),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1967), 15–44.
- , "Some Mid-Ch'ing Views of the Monarch,"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IV:2:29–43 (Feb. 1965).
- , "The Politics of Filiality: Justification for Imperial Ac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VI:2:197–203 (Feb. 1967).
- , *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 (Cambridge, Mass. 1971).
- K'ang-hsi, *The Sacred Edict, Containing Sixteen Maxims of Emperor Kang-hsi*, tr. by the Rev. William Milne, 2nd ed. (Shanghai, 1870).
- Kessler, Lawrence D.,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Chicago, 1976).
- Lee, Robert H. G.,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 (Cambridge, Mass., 1970).
- Ma, Feng-ch'en, "Manchu-Chinese Conflicts in Early Ch'ing," in E-tu Zen Sun and John DeFrancis (eds.), *Chinese Social History* (Washington, D.C., 1956).
- 孟森：《清代史》（臺北，1960年），第1–3章。
- Michael, Franz,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Baltimore, 1942).
- 宮崎市定：《雍正帝，中國の獨裁君主》（東京，1950年）。
- 內藤虎次郎：《清朝史通論》（東京，1944年）。
- Nivision, David S., "Ho-shen and His Accusers: Ide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David S. Nivision and Arthur F. Wright (eds.),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1959), 209–243.
- Oxnam, Robert B., *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 (Chicago, 1974).
- Ripa, Matteo,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tr.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o Prandi (London, 1855).
- Rossabi, Morris,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1975).
- Sanjidorj, M.,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New York, 1980).

沈雲：《臺灣鄭氏始末》（1836年），共6卷。

Smith, Richard J.,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2* (Boulder, 1983).

Spence, Jonathan D.,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New Haven, 1966).

——, “The Seven Ages of K'ang-hsi (1654–1722),”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VI:2:205–11 (Feb. 1967).

——, *The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New York, 1974).

Spence, Jonathan D., and John E. Wills, Jr.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1979).

杉村勇造：《乾隆皇帝》（東京，1961年）。

Tao, Jing-shen, *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Seattle, 1977).

Tsao, Kai-f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lars and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Lanham, Md., 1984).

和田清 (Wada, Sei)：《東亞史研究 (滿洲卷)》（東京，1955年）。

Wada, Sei,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ise of T'ai-tsu, the Founder of Manchu Dynasty,”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okyo, 1956).

Wakeman, Frederic,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2 vols. (Berkeley, 1985).

Waley-Cohen, Joanna,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New Haven, 1991).

Wills, John E.,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Mass., 1985).

Wu, Silas Hsiu-liang, “Emperors at Work: The Daily Schedules of K'ang-hsi and Yung-cheng Emperors, 1661–1735,”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VIII:1–2:210–27 (Aug. 1970).

——, *Passage to Power: K'ang-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 (Mass., Cambridge, 1979).

楊陸榮：《三藩記事本末》（1717年），共4卷。
